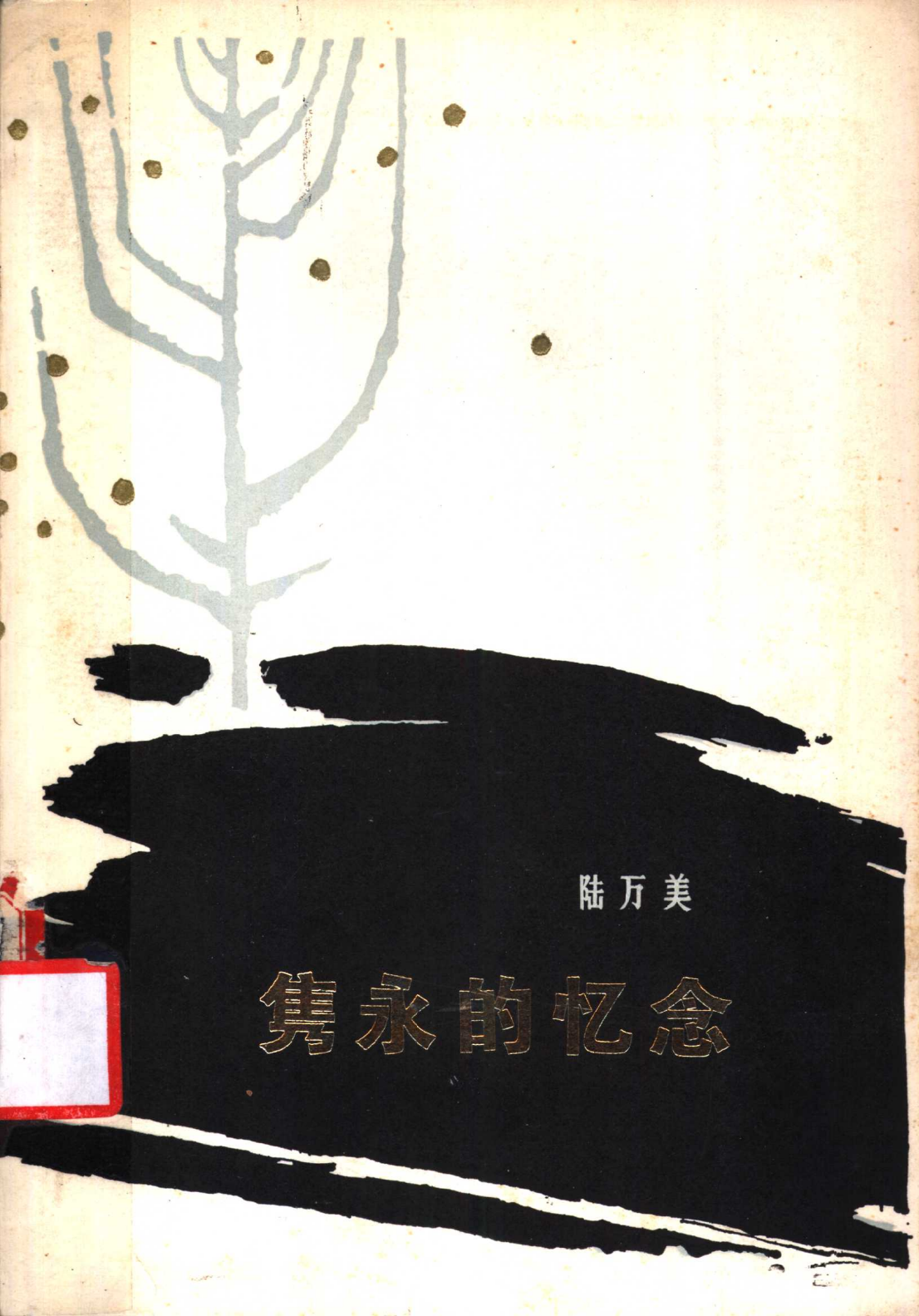




陆万美

隽永的忆念

隽永的忆念

陆万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出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7,000

1981年1月第一版

198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50

统一书号: 10116·827

定价: 0.55元

内 容 提 要

陆万美同志从事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五十年来，三十年代曾任北平“左联”出版部长。作者在《隼永的忆念》这个集子中，回忆“抗敌演剧六队”，回忆“北平文总”、“北平左联”，以及对鲁迅、郭老、聂耳、艾思奇等的回忆文章，都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新文学史料，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抗演六队
出发武汉
前线，挺
进皖苏鲁
敌后前合
影。（中
立戴眼镜
者为洪深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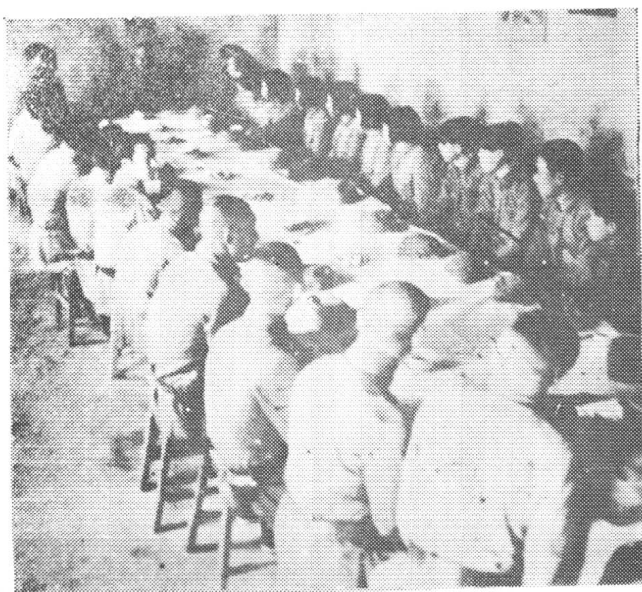


抗演六队
在武汉街
头演出、
宣传讲
话。



抗演六队
惠行同志在宋埠
前线遭日
机轰炸牺
牲后，埋
葬前举行
简单哀
悼。

抗演六队
经长途跋
涉行抵山
东沂蒙山
区，与东
北军座谈，介绍
抗战形
势。



目 录

文艺在战火与迫害中前行·····	1
——周总理四救抗演六队	
〔附〕介绍抗演六队队歌《我们走遍祖国》	
隽永的形象和深切的怀念·····	25
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	30
承继鲁迅战斗传统，完成文艺工作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光荣任务·····	42
青年向鲁迅学习些什么·····	47
红梅山茶忆郭老·····	50
两届“北平文总”的一些情况·····	58
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	64
艾思奇同志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和写作生活·····	75
——记《云南民众日报》副刊及其他	
把热情与兴趣汇注入正流的界堤·····	94
——忆聂耳在北平	
你应该欣慰欢笑了·····	112
——为聂耳同志四十五周年祭	
民族歌手欢唱声中忆袁勃·····	115
《刘澍德小说选》序·····	134
后 记·····	142

文艺在战火与迫害中前进

——周总理四救抗演六队

一九三八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武汉，为了抗日宣传工作的需要，和国民党进行了斗争，将上海和平津的一些受国民党百般迫害的进步文艺宣传团体，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当时，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获得了胜利，周总理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这些演剧、宣传队伍，就是在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以所取得的合法地位和条件，分别奔赴前线和敌后的城市和农村，他们克服一切艰险障碍，在广大军民中热烈开展了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的伟大的历史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

这些演剧队是革命的文艺战斗队，他们活跃在祖国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从前线到敌后，从城镇到乡村都散播了先进文化的花种，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创造了一段特别突出又蓬勃发展的光辉业绩。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前半部，反映的正是演剧队战斗生活的一些侧面。但坚持抗战和进步，必然遭到国民党反动

派的各种阻碍和迫害的事实，影片里并没有得以正面反映。正象郭老在《洪波曲》里提到的“他们……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那真是罄笔难书。他们有的……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但他们一直没有辜负党和周总理的教导，而且在遭受一切危难打击时，周总理一直也在关怀着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支持营救他们。我们抗演六队从前线到敌后的经历就很为艰险、曲折。而在几次主要的关键时刻，也都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挽救。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我想记下我们对总理难以描述的怀念和永远的感戴。

从“停止活动”转为奔赴前线

“抗敌演出队六队”的前身，是《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这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批北平、天津的进步学生冲出日寇的残杀和封锁，集中到当时抗战中心的武汉来，在党的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为骨干，组成的一个抗日文艺宣传团体。最初只是十来个人，有四五个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蓬勃开展起来的话剧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其他则从来还未登过舞台，演过戏。但每个人都刚“从敌人的屠刀下冲出”亲身“痛尝够亡国的残害耻辱”，因此，全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和愤怒。每个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没有戏剧专家也要搞救亡戏剧的宣传活动，没有任何服装道具也要想法演出戏来；每天啃着烧饼油条，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也要到街头、码头、工厂、车站去演出。自己凑钱买了点油彩、化装

品，借了点服装道具，排了四五个小节目，每天就出去演出两三场也毫不觉得累。女同学们很快克服了胆怯害羞，每场戏都演得充满了激情。自己在真诚地深刻控诉侵略者的凶恶残暴，蛮横无理，而痛哭流泪，激昂慷慨，广大的工人、市民、军队、学生观众，也深深受到感动，常常是演员和观众都一同热烈地高呼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散场后还围拢来亲切交谈，关心我们各方面的情况，给我们赞扬、鼓励，表示“一定都要抗战到底”。

当时，团内由王泽文、秦霜等同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加强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团内革命化、战斗化的气氛很浓厚，大家过着战时共产主义的艰苦生活，工作又十分紧张，也从无怨言。有的同志泻肚很厉害，照样坚持演出。以后党又不断介绍了一些人来，有三十年代初期就在北平参加左翼戏剧演出的女同志，有医学院毕业而又喜爱戏剧活动的同志，甚至两位娇贵的小姐，旧北洋军阀的内阁总理段琪瑞的孙女也改换了名字，随着她们热爱话剧的哥哥来参加了演出队，在演出时也一样热情很高，不怕艰苦。

力量增强了，上级党组织就指示我们：“要到广大农村、工厂、部队去开展工作，不应该老呆在城市里”。当时，总理正在武汉主持党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要动员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农村、工厂、工农兵群众中去。”我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立刻订了计划，离开武汉，出发到鄂西八个县的农村去，开展游动巡回演出工作。正当我们要取得一个合法的通行证件的时候，国民党的湖北省党部却多番为难，到最后迫于整个形势不得不允许时，又提出了两个限制：一

定要把剧团名称里的“平津学生”改为“战区学生”，同时要把“抗敌”两字删掉；行动的路线也由它规定，只准到鄂西的天门、钟祥、荆门、沙市等八个县市去。它们还秘密通知这些县市的国民党部，要“限制、监视”我们。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中旬，我们首先出发到天门县去。我们各人带着自己的行李，团里也购买了一点简单的化妆品和道具、纸笔颜料和政治业务书籍以及常用的药物。我们本来没有任何活动经费，这些费用是靠在武汉剧场卖票演出了几场，得到几十元的收入，同时也承一些进步人士如沈钧儒先生等给了少量的捐款。剧团里不发零用钱，就连牙膏、肥皂都是靠手边稍宽裕点的同志买了大家共用。最起码的三餐饭食的解决，自然也很困难，有时是靠所到的农村接待，有时则靠在县城或小市出卖一、两场票的收入维持生活。

但这些困难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日夜不停地、热情积极地去水利工地、轮船码头、边远农村演出，也教唱救亡歌曲，所到之处都用石灰写标语，在大墙上画漫画，边演出边在白布上展览自己绘制的一套套连环图画。不论风风雨雨，天寒地冻，我们都不知休息地坚持战斗。我们每到一处，听说是“北平的大学生来演戏宣传”，都受到农民、工人、青年学生、城市居民的热情欢迎。演出中常常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口号声不断，在几万人的汉水水利工地演出后的气氛更是震天动地，激动非常。各地国民党的驻军也不断主动来邀请我们去演出。如到驻荆门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去演出时，效果就特别好，当演唱《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或剧目时，许多官兵都流出了眼泪，还

有人不断到我们住地谈话，交换对抗战前途的看法，表示“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甚至蒋介石的嫡系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也来邀请我们去演出，效果仍然很强烈，中下级的官兵热情激动，高喊“抗战到底”。连傲慢矜持，官僚架子很大的王耀武等高级军官，接谈时也表示：随时准备到前线去，有信心可以最后胜利。

我们的工作常常也不那么顺利。有一天晚上在天门县农村的一个小镇正准备演出，突然听到一股土匪要来袭击这个渔新河镇。只好赶快停演，匆忙地收拾了行李，在当地进步青年的帮助下，找到三只小船，荡到一个小湖的芦苇丛中隐避起来。更为严重的则是各地国民党官僚，特务的造谣威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限制，但各地也总会有一批要求团结抗战的进步人士和青年组织，我们就很注意不断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在各地也一直得坚持开展工作。

最严重的打击，在五个月后终于出现了。那是我们刚到鄂西的重要城市沙市，进行了街头宣传，正准备要在中山堂演出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突然发来了一个通令，要我们“立即停止活动”。他们还同时通知了鄂西的其他几个县不让我们再去演出。许多进步人士以“因为街上已经贴了海报，报纸也发过消息，群众都很想要看”为由，提出让我们少演几场，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限制、百般阻挠，它使我们受到了更深的教育，认清了他们不是真正想抗日打鬼子。事实完全说明了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政治上只想倒退，维护他们的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

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前进后退的行动线路都全被堵塞

了。再过几天日常的三餐饭食也无钱购买了。在这样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只好由党组织派出少数几个同志回武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示。

我们的困难情况，很快就汇报给了周总理，同时也取得了社会上广大进步人士的支援。经过多方面的酝酿商量，最先决定由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等同志，以同乡关系，接洽好到刚从台儿庄撤退下来休整的六十军云南部队暂时工作一段。三八年五月中，我们全团集中回到武汉，然后即转移到驻黄陂、宋埠一带的卢汉部队。卢汉是军长，领导三个师。到三个师的各个部队去进行慰问演出，祝贺他们台儿庄的胜利，鼓舞他们的士气。正当我们热烈开展对当地军民的文艺宣传，同时也进行些农村社会调查的时候，六月下旬，就得到军委政治部的正式通知，已批准把我们改编为“抗敌演剧队第六队”，要我们立刻赶回报到，参加武汉市“七·七”一周年的宣传活动，然后正式建队。这就是周总理向国民党斗争的结果，也是总理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和第一次的拯救。那时我们二十来个热血青年处在山穷水尽，无路可寻的情况下，忽然得到继续进行救亡宣传工作，并奔赴前线的机会，大家高兴得都蹦跳起来，连夜热烈地谈论得简直忘了睡觉，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出来呀！

“坚决挺进敌后”

参加了武汉市盛大的宣传周活动，我们十个演剧队就正式建立，并在昙华林第三厅集中整训，整编充实。我们抗演六队在演

剧队中是较年轻的。戏剧专业知识不多，演技水平也较低。上海进步剧人的老大哥们就给我们交流、介绍了许多好经验，从他们示范演出的好些个优秀节目中，我们也得到很多启发教育。大家也共同组织了一批创作。郭沫若、胡愈之、田汉、洪深等领导同志，还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宣传工作以及戏剧的编剧导演各方面的知识。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在百忙中还来看了我们各队的联合演出的新剧目，给了我们许多重要指示和热情鼓励。特别给我们教育影响最深的则是：当九月初我们要分赴各战区前线时，临行前总理冒酷暑，专门来对我们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敌我友各方面的具体军事情况谈得那么详尽，一切部队番号，兵力配备的数字和战略、战术的特点，都完全了如指掌，真象把各方面参谋部的材料都摸得一清二楚似的。总理分析了敌我友军当前的情况意图后，就进一步提出了我们应采取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几种可能的前途，甚至对整个军事行动发展的时间表都有比较准确的估计。后来谈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光辉的军事著作，才知道周总理是完全贯彻和更具体生动地解释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党的整个战略方针。总理要求演剧队：要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向广大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一定要坚持抗日到底，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也要求大家不仅去做演剧宣传工作，还要做救护伤兵难民等战地服务工作。总理还传达了毛主席“到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解决了不少演剧队员只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思想。

九月下旬，抗演六队和四队，出发到当时处于前线的麻城县的宋埠。这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的指挥驻地。在这里，我们碰到臧克家同志领导的五战区文化服务队（内有许多今天的名诗人、作家），金山同志带领的“上海演剧二队”。正当我们各队组织慰问演出的时候，一天下午，日寇三十多架飞机，突然袭击宋埠，来回轮番地轰炸扫射了一个多小时。炸弹象划着一条条总线似地一个接着一个扔了下来，不停轰鸣巨响，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震动颤抖。宋埠有半里长的街道房屋大部分都被炸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队的惠行志同志，一个热情朴实的上海产业工人，正去街头购买演出用的道具什物，当场被炸死。沙千里等二十来位武汉著名文化界人士组织的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和我们一起跑到不远的城墙边，找到一条窄狭的巷道隐蔽起来，大家全伏在地下，随时等待着可能就有一两颗炸弹恰恰落到这夹墙中来，这长时间的轰炸，使每个人都经受了战火的直接锻炼，也使每个人不断想到自己生与死中各样问题，总的大家都异常生气，为什么我们竟这样任人残暴蹂躏，毫无防守的能力。但幸运的是：炸弹只在二三十米的前后左右爆炸，机枪子弹也未直接扫射到这个夹墙里来，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一个也没有受伤害。轰炸结束，我们一个个爬起来，拍打了满头满身的灰土，立刻便跑出夹墙，找到了惠行志同志血淋淋的尸体，用一块门板抬着，一个个含着眼泪，沉重地走向我们在城外一个小村的住地。当晚，我们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在村头的小树林里，挖了坑把他埋葬了。

经历了这样残酷的大轰炸，六队的部分队员曾一度出现不安

情绪，少数几个不坚定分子当天深夜就约着悄悄地逃跑回武汉去了。第二天，我们去找五战区的长官部，他们已撤离到鄂西的老河口去了，幸而战区文化委员会钱君瑞等同志还未走，他正式通知我们队去大别山敌后，四队去老河口。

当时，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还在纷纷混乱地撤退，飞机仍不断来侦察扫射。我们的队员又零碎地先后走了几个。剩下的十六个人，有的很坚定，有的动摇犹疑，提出种种理由“要往后方撤”。这时党支部的同志比较坚定，正分别进行着艰苦的思想工作，很快便传来了周总理的坚定指示：“一定要到大别山敌后去，那里非常需要你们去。赶快整顿一下队伍，立刻向前进。谁动摇、不愿去的，就让他走。”

周总理的指示，象给我们敲了响亮的警钟，象黑夜海洋中的灯塔，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我们斗争的意志。我们很快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精简了一切可带可不带的公私什物，只包扎了最必要的服装道具和行李，就向着正在兵荒马乱撤退的相反方向，向东前进。在一个熊熊火光照红了半边天空、不远处炮声隆隆轰鸣的深夜，我们这支年轻的小小的队伍，怀着坚强的信心，向遥远的大别山敌后挺进了。这是总理在关键时刻第二次又给予我们最大的关心和拯救。敬爱的总理引导我们沿着党中央、毛主席革命的正确方向路线前进，让我们在当时能坚定地奔赴敌后，为抗战、为人民多多少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以后几十年，在逐步经历的各种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一直紧跟着党，走中国青年应走的革命的正确道路。

解除了大别山工作的困境

红安城被轰炸一空，断墙残柱继续被烈火燃烧着，冒着烟。沿途尽是军队在很乱地溃退，见不到任何一个还活着的老百姓。在沿途小村庄的空屋里，疲惫不堪的士兵一倒在乱草堆里睡下就不会醒。白天飞机还不断来回地侦察、扫射，有时还扔下几个炸弹。晚间，下起滂沱的大雨来，路上的泥泞把我们的草鞋都沾脱了。但我们仍不停地继续前进，有时在田埂边躲一躲掠空低飞而过的敌机，简直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里伸出头来直接往下看的飞行员的眼鼻。我们有的同志满心想搞几支枪，将来好在敌后打游击。沿途不少散兵为了减轻负担，不断丢弃了很多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我们都收拣得不少，挂包里装得满满重重的（后都送给了新四军），但枪枝却怎么也搞不到。倒是动员了两个四川部队的年轻散兵同意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帮我们拿道具、做炊事员（这两个人几年之后都成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中级干部）。

过了七里坪，在一个山坡上我们和新四军专门派来接我们的一个干部见了面。这是董必武同志在武汉发电报给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郑位三同志，让他派人来迎找我们的。由那同志指引了路线，我们就不再休息地继续前进。一直走到深夜，才安全到达了游击根据地指挥部所在的山村。在这里，我们算找到了党所领导的英雄的游击部队和在红色区域斗争多年的革命人民，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郑位三同志是我们早已崇拜的鄂豫皖苏区的优秀领导人之一，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总算安全地到达了，这里就

是你们的家，要好好休息几天再走。”

在这个老革命根据地我们休息了个把星期。我们向各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出，也到连队里去教歌、开座谈会。老的红军战士给我们讲了许多以前和国民党白匪军斗争的故事，我们的一些青年同志对每一次的战斗和他们富有传奇风味的游击生活，非常感兴趣，从中受到许多革命思想和优良传统的教育。还记下老红军们当年自己创作的，十分精粹生动的诗歌。

这时，武汉已经失守，从收到的电报里已得知整个抗战形势已经转入了长期相持的第二阶段。我们请郑位三同志给我们作了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武汉失守后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指示，也分析了大别山在新的战略阶段中，它在南京、武汉、徐州、郑州四个战略据点之间的极为重要的地位。郑位三同志鼓励我们要进入大别山区，做好广大军民坚持团结抗战的宣传工作。后来，李先念副主席当时领导的部队，又专门派了一个排，护送我们进入大别山。

和我们同行的有专去大别山工作的新华社记者何伟同志。我们按照部队的行军布署和严格要求，一律白天睡觉、夜里行军。通过重重的封锁线，还有两个同志在过公路时走岔了路，竟然走近了敌人的据点附近，看到了敌人烧的篝火，也听到了马嘶声和远远的敌人用日语的对话声。他们这才赶快折转身，辨认着天上星星找出方位，紧赶忙赶地追上了部队。我们从晚上一直走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来到一个单家独院的老百姓家，新四军同志还在这个独院四围的小山头上放了岗哨，我们则倒在大堂屋的草堆上，枕着行李饱饱地睡了一觉。我们疲乏得连几只公鸡跳到我们